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CAMBRIDGE

# 语言与心智

(第三版)



*Language and Mind*  
(Third Edition)

[美] 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 著  
熊仲儒 张孝荣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语言与心智

## (第三版)

[美] 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 著  
熊仲儒 张孝荣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与心智：第三版/（美）乔姆斯基著；熊仲儒，张孝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20557-1

I. ①语… II. ①乔…②熊…③张…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英文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3150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语言与心智 (第三版)

[美] 诺姆·乔姆斯基 著

熊仲儒 张孝荣 译

Yuyan yu Xinzhi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6.2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2 000

定 价 4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Language and Mind*  
(Third Edition)

#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第三版序言

接下来的前六章发表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主要是基于为普通的大学听众所做的演讲，所以相对不正式。最后一章发表于 2004 年，也是基于对普通听众的演讲。最近的一篇回顾的是“生物语言学的方法”，它自半个世纪前生成语法创立之初就开始指导这项工作，展示了它近几十年的发展及目前的状态，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vii

20 世纪 50 年代研究语言与心智问题的主要方法是行为主义科学的方法。正如该术语所示，行为被当作它探究的对象，或者说，对语言学而言，它探究的对象就是行为的成品，可能就是一堆语料。这堆语料是用“田野调查法”这门课程所教授的诱导术（elicitation technique）从被调查者那里获得的。语言理论主要是由切分、分类等分析程序构成，用来组织语言材料，受诸如结构属性与结构安排等有限的假设指导。著名语言学家马丁·裘斯（Martin Joos）在其 1955 年的阐述中，认定当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决定性方向（decisive direction）是，语言可以在“不需要任何先在的关于语言必须是什么的方案的情况下得到描写”，他



并没有夸大其辞<sup>①</sup>。各种流行的行为科学的方法基本上差异不大。当然，没有人接受那不合逻辑的“白板”（blank slate）说。但通常假定除了一些在环境〔就具有巨大影响的哲学家奎因（Quine）的框架而言，这里的环境（environment）即为“质量空间”（quality space）〕中发现的属性的初始边界之外，一般的学习机制应该足以解释有机体包括人类的所知与所为。在这些领域中，基因遗传的贡献无望超过学习机制。

viii 新兴的生物学方法采取不同的立场，它所探究的对象既不是行为也不是行为的成品，而是内部的参与活动与解释的认知系统，以及这些内部系统生成与发展的固有生物本质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它关注的核心话题是16世纪瓦尔特（Juan Huarte）所当作人类智力的本质东西：人类心智的能力“在内部并由自身能力形成，是知识所依赖的原则”<sup>②</sup>。这些观念的一些重要方面在其晚年的哲学—科学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对语言而言，“知识所依赖的原则”是人们所习得的内部语言（I-language）的原则。琼斯习得了这些原则，就有了广泛的知识，比如说，她会知道“glink”是英语中可能的词而“glnik”不是；她还会知道“John is too angry to talk to (Mary)”在“Mary”不出现的时候表示“John is to be talked to”（有人要跟约翰谈话），而在“Mary”出现的时候表示“John is to do the talking”（约翰会去谈话）；她会知道句子“I wonder who John expects to see him”（我想知道约翰希望谁来见他）中的“him”（他）用来指“John”（约翰），但在“I wonder who”省略掉后，“him”不能用来指“John”；也知道“John painted the house brown”（约翰把屋子涂成棕色）表示约翰将涂料涂在屋子外面，尽管也可以表示约翰把屋子内部涂成棕色；也知道“John climbed the mountain”（约翰爬山）表示约翰上山，尽管也可以表示下山；也知道“book”在句子“John memorized and then burned the book”（约翰熟记

① 裘斯清楚地提到美国结构主义的“鲍阿斯传统”（Boasian tradition），对欧洲结构主义只有少量的评述，甚至态度有些轻蔑。这种态度仍然存在，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见68页的注释）。（指英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后不一一注明。——译者注）

② 请参见第一章中的8~9页。

然后烧毁了这本书)中既有抽象义又有具体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此类的语言知识依赖于 I 语言的原则,产生 I 语言原则的能力被理解为遗传性禀赋的一部分,遗传性禀赋解释语言知识的生成与发展。

这种理念的语言学,它寻求发现特定的 I 语言(语法)的真正理论,从更深层面说,就是发现以遗传为基础的语言习得的理论(如普遍语法 UG,我们赋予这一传统术语新的用法)。其他的认知系统,也被假定按同样的方式设计,每个认知系统都有自己的原则与产生这样的原则的能力。

在这样的框架里,认知系统实际上被理解为身体,主要是大脑的器官,其探究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跟其他有着不同属性的子部分的探究相同,这些子部分包括视觉系统、运动规划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等。这些“认知器官”连同其在行为上的角色,进入传统上被当作心智的活动,如思维、规划、解释、评价等。这里的“心智”是非正式的、描写性的术语,跟“化学”、“电子”、“光学”等随意性描写性术语差不多,和那些常用来聚焦于世界的特定领域的术语也差不多,这些领域都有完整的特征,也值得分离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但不要抱有任何界线分明的幻想,它们在连接处对自然界的切分不会泾渭分明。行为及其产品如语篇提供可能有用的语料,这可作为决定认知系统的本质与来源的证据,但 ix 对这种探究而言并没有优越的地位,正如对身体其他器官的探究一样。

研究视角的总转移有时被称为 20 世纪 50 年代的“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然而根据早先论文所讨论的理由,我认为把它理解为 17 世纪认知革命的复兴与进一步发展更为合适。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许多传统的问题重新被提起,遗憾的是人们对传统不熟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或被误解。被重新提起的还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被称为心智”的属性是“器官结构如大脑”的结果(化学家和哲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的说法),这种观点的成形贯穿于 18 世纪。很多文献中所说的“洛克建议”(Locke's suggestion),它的发展是牛顿革命的自然而又不可避免的结果,它实际上取消了“身体”或“物理”(physical)这样唯一有重大意义的概念。洛克的基本结论在 19 世纪得



到了很好的理解。达尔文委婉地问道“思维这一大脑的分泌物”为什么应被认为“比重力这一物质的属性更精彩”。弗里德里希·朗格(Friedrich Lange)在他经典的19世纪唯物主义史中,观察到科学家“使我们习惯于力这一抽象概念或习惯于一种游移于抽象理解与具体理解间的神秘晦涩的概念”,出现了唯物主义史的“转折点”(turning-point),它从17世纪“真正唯物主义者”的信念和关注中剔除教条中的残余思想,并剥夺其重要价值。在研究“被称为心智”的领域时,不需要特别关注这些<sup>①</sup>。

传统的理解仍被视作是极富争议的,用完全相同的字眼复述一遍,就是被视作“大胆的假设”(bold hypothesis)或“激进的新理念”(radical new idea),这可能值得注意。

最初认知革命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认识到被称为心智的世界的属性,这一属性可能包含有限器官的无界性(unbounded)能力,用洪堡特的话说就是“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这一信念是笛卡尔主义者关于心智概念的核心内容。它提供了处理“其他心智”问题的标准,即确定其他生物是否也有类似于我们人类的心智。笛卡尔及其继承者特别强调语言的使用并把它当作最清晰的证据。与此相同,休谟后来也认为我们的道德判断在范围上也是无界的,它也一定建立在属于我们本质的一部分的一般原则之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遗传决定的。那个观察提出不同领域的瓦尔特问题,如今它是激发经验研究和概念分析的论题。

到了20世纪中叶,可以比早先更能实质性地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了。到那时,对无限范围的有限生成系统有了清晰的综合理解,该生成系统对那些晦涩的传统问题的重构与探讨能很容易地适应。在认知革命的复兴中,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是动物行为学家与比较心理学家的研究,其关注点是“出现在类人类生物体研究中的天赋论工作假设”与有几乎一样特征的“人类先验论”,这些观点那时就已经比较容易接受了<sup>②</sup>。

---

① 关于例证和讨论,请参见我的《语言和心智研究新视野》(*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该书于200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请参见本书第三章的83~84页。

该方案也适应于人类认知器官及其由遗传所决定的本质的研究，由遗传所决定的本质构建经验——用动物行为学的术语说，就是生物体的环境（Umwelt）——并且引导发展的总体路径，这跟生物体成长的所有其他方面相同。

同时，锐化和改善程序路径的努力也会面临众多严重问题，暴露了其固有的不足之处。一个基本问题是，即使是话语的最基本成分也不能通过切分和分类这样的程序发现。这些成分并没有操作这个程序所必需的“念珠模型”属性，在物理事件的可识别部分也常常不能定位，物理事件对应于心智内部的表达式，而在心智表达式中起作用的是语言成分。即使是最简单的单位，如语素这样最基本的词项，就最简单的单位而论，即使是语音中的音段，也能仅通过它们在生成程序中的作用进行识别，这越来越清晰了。生成程序形成语言表达式，反过来，语言表达式可被当作心智/身体的其他系统的“指令”。这些指令被用来进行心智操作，同样，也用来产生话语和对外部信号的解释。更一般地说，对行为主义科学中行为控制与学习所假定的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它根本不充分，甚至在学科的核心部分也引发了严重的质疑，如整个事业是否可靠，但这些质疑不包括对其他目的而言可能有用的用于实验设计的功用。

对语言的研究而言，自然的结论似乎是所获得的 I 语言大致具有科学理论的特征：一套完整的能推导出语言表达式的规则与原则系统，每一个规则和原则都是思维与行动的指令总和。儿童必须以某种方式从不断变化的经验中选择 I 语言。这个问题类似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在考虑科学发现问题时所说的“不明推论式”（abduction）<sup>①</sup>。正如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没有皮尔士所称的“可接受假设的限制”，该任务是不可能的。即只准许某些理论被考虑，而不是无限制地考虑很多其他理论，虽然这些理论也跟相关材料相印证。对语言研究而言，语言机能的遗传性禀赋似乎为规则系统强加格式，该格式相当严格，以致候选的 I 语言“被分散”，甚至只有少量的 I 语言在语言

xi

① 请参见本书第三章 79～81 页。



习得过程中能被考虑。在认知科学的近期研究中，这种方法常被称作“理论的理论”的设想<sup>①</sup>。就成长与发展的每个方面而论，语言习得像不明推论式一样面临着刺激缺乏的问题。总的观察如此透明，以至于认知科学外部的普遍存在的现象没有被重视，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没有人有这样的胚胎提到刺激缺乏问题，这种胚胎在给定的营养环境下或在出生后发育的任何时期，比如说经历青春期以某种方式变成虫或猫。

在后边重印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章里，所提及与讨论的语言的本质与习得采用了最新勾勒的一般框架。“语言学中最具有挑战性的理论问题”则应当是“发现普遍语法原则的问题”，普遍语法原则“决定着假设的选择”，也就是说，限制着可获得的 I 语言。然而，它也认识到对语言，同样对其他的生物体而言，一个更加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即将出现：除了研究特定的认知器官或其他器官系统，还要发现“决定可能成功的突变与复杂生物体的本质的法则”<sup>②</sup>。多年前也得出了相同的观点：“以下看法当前没有理由认真对待：即把复杂的人类成就〔像在行为科学中那样〕归结为数月（或最多数年）的经验，而不是〔像在特殊的生物禀赋，即语言中的普遍语法的研究中那样〕归结为数百万年的进化，或归结为深植于物理定律的神经组织的原则。”<sup>③</sup> 这种物理定律是成长与发展的“第三因素”，依存于器官或生物体。第三因素的研究似乎离探究很远，以致让人觉得不值得过多注意，所以也很少被人提及，然而事实上就是早先的研究（如对规则系统中冗余信息的消除）也潜在地受此关注的导引。

总的来说，在随后几年，所研究的论题不仅在语言相关的领域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展，也在认知科学领域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研究视角在语言学内部有了实质性转变，这在相当大的

---

① 这种方法的支持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我相信理解有误。请参见安托尼与霍恩斯坦的《乔姆斯基及其批评者》第十章及其回应，该书于 2003 年由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L. Antony & N. Hornstein, *Chomsky and His Critics*, Blackwell, 2003）。

② 请参见 85 页的脚注。

③ 请参见我的《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N. Chomsk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5）。

程度上重构了基本问题，并且为了支持一种方法而完全放弃了语言学理论中的格式概念 (format conception)，这种方法试图将可得到的 I 语言限制成一个有限的子集，这种限制不针对词项的选择（这些有很高的限制性）。除了词项的选择（这些有很高限制性），原则参数的方法也试图将可得到的 I 语言限制成有限的集合。这种原则参数的方法，其结果可能合理，也可能不合理，我们永远不知道。但作为一个研究方案，它已非常成功，引发了对类型学上的广泛的各不相同的语言进行经验探究的爆发，提出了以前根本提不出的新的理论问题，同样也经常给出至少部分是正确的答案，同时也复兴了语言习得与语言处理的相关领域。另一后果是它为严肃地探究更深层的“第三因素”问题而移除了基本概念上的一些障碍。这些论题在最后一章做了回顾。至少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它们引出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明个体语言研究与更一般的心智问题的研究将面临新奇而又令人激动的挑战。

## 第二版序言

后边的六章内容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的三篇构成了专著《语言与心智》的内容，出版于 1968 年。这三篇是关于语言学（过去、现在、未来）对心智研究的贡献的论文，后边所重印的第一版《语言与心智》序言对它们的来源做了说明，它们是在贝克曼讲座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的，于 1967 年元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是对全校听众的演讲。这些论文构成一个有别于后三章的单元。 xii

第四章“自然语言的形式和意义”跟另一非正式演讲的文本非常接近。这个演讲是 1969 年元月在明尼苏达州的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学院所作，听众主要是中学与学院的师生。这篇文章回顾了出现于语言、心智和其他研究中的基本观念，另外也谈了句法结构的语义解释的近期研究。我相信，这些材料揭示了早先理论的局限与不足，也为这种理论的修订指明了方向。更多的相关技术探讨将发表于我的新作《生成语法中的语义学与规则的限制条件》，该书将于 1972 年由海牙的穆顿公司出版。

第五章详细地探讨了预设的或只在《语言 and 心智》中非正式形成的材料，有很强的技术性。这一讲预期的听众主要是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



学家。这一章最初是作为莱尼伯格的《语言的生物基础》的附录发表的，它试图简明而又系统地介绍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并探讨它对人类心理学的潜在价值。《语言的生物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沿着这章简单提及的技术研究方向做了进一步的探讨。这章实际写作于1965年，是这里所收录文章中最早的一篇。

xiv 第六章是讲给完全不同的听众听的，如专业哲学家，它是投给1968年4月在纽约大学举行的语言学与哲学论坛的。这一讲的目的是探讨当代语言学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与心智哲学的关联，这表明语言学的当前研究能对人类知识的本质、习得基础及其使用的典型方式等问题给出有趣的见解，文章也部分地关注了由这些问题所引发的争议。

这些文章有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冗余。四、五、六这三章各自或多或少有着独立性。这几章都只做较少的预设，这使得一些说明部分会重复，甚至会跟《语言与心智》的那三章出现重复。基本观点在各章以不同程度的变化方式进行表述，我希望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事实上，即使是这些篇目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观点也被广泛地误解。比如说，在一些大众化的讨论中，就有一种误解“深层结构”与“生成语法”或“普遍语法”的倾向。一些职业的语言学家也反复误解我所说的“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与生成语法的递归性，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希望诸如此类的问题能够被澄清，所以我在编这本集子的时候没有消除冗余的信息。

第四章到第六章进一步扩展和详述了贝克曼讲座中讨论的思想和材料，这些文章主要关注的都是语言学、哲学与心理学的交叉领域。其主要目的是说明语言结构的技术性研究对人类智力的理解有何贡献。在这些文章中，我相信并且也在努力说明语言结构的研究可以揭示心智的属性，其中的心智属性是普通行为中人类心智能力的训练的基础，而普通行为则包括语言以非常一般的方式自由而创造性地使用。

最后以信息的冗余性为代价，我在这里还想强调一下《语言与心智》序言中关于所谓的“行为科学”的观察。目前有很多关于行为科学对人类事件的影响的讨论，这种讨论不是太少而是过多。记住下面的话很重要：我们缺少的是，跟人类如何做出某种行为与他们为什么做他们

在通常环境下所做的行为相关的重要假设。我相信，有过文献搜索这一有用训练的读者不仅会发现这个领域重要的科学知识很少，而且会发现行为科学通常坚持某些有限制的方法，这种限制导致它实际上不可能获得重要的科学知识。

我们可以从人类知识与信念系统在某些领域是如何获得的这一问题开始看起。语言方面特别有趣，因为语言在思维与人群互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也因为我们可以着手描述所获得的知识系统并阐述一些关于人类内在能力的貌似合理的假设，这些内在能力使知识系统的获得成为可能。对理解的这些朦胧认识本身很有趣，它对其他研究同样也有启示性。我们有理由肯定，探讨经验与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和刺激与反应之间的直接关系，总的来说是徒劳的。在差不多最基本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所知、所信与所预测。人类行为的研究如果不是基于尝试构建的知识和信念的相关系统，那它无论如何都注定是无足轻重的且无关紧要的。只有当知识和信念的系统尝试性地建立起来，才能以严肃的方式开始人类学习的研究。我们才可以根据经验材料探讨这些系统是通过什么方式习得的。类似的是，除非我们能够探讨人的所为如何关联人的所知、所信与所盼这样的问题，否则很难以严肃的方式从事人类行为的研究。只有当我们尝试性地建构了所学的假设，我们才能严肃地从事人类学习的研究；只有当我们尝试性地建构了已学（包括所知与所信）的假设，我们才能严肃地转向行为的研究。就语言来说，我们可以对正常的说话者—听话者的所知与所学进行一些尝试性的但相当详尽而又复杂的描述。正因为如此，语言研究让我对人类学习和行为的研究特别感兴趣。

但必须强调的是语言可能更特殊。语言知识通常是通过简短的接触获得的，所获得的知识的特征可能很大程度上是预先决定的。人们希望人类语言可以直接反映人类智力的特征，而且语言可以用其他的知识和信念系统所不能的方式直接“反映心智”。更进一步说，即使我们能够按照这些论文所讨论的方式解释语言的习得，我们仍旧需要解释所习得知识的正常使用。但就目前而言，这是个难题。它已经超出了科学探究

xv



的范围。当然，仅仅因为它们超出了科学探究的范围，就主张某些现象与某些问题的不存在也是完全不合理的——就目前而言，可能本质上是囿于人类智力的范围，毕竟我们对人类智力自身的结构与界限的方式所知甚少。鉴于人类与社会研究水平较低的特征与对智力实体研究的总体缺乏，我们只能对参与人类行为的本质的与基本的因素进行猜测，否则就会不负责任地下结论。对这些问题进行猜测是合理的，甚至是本质的。如果有可能，猜测应受这种有限的、零散的知识的指导。但猜测应清晰地做这样的标记，并清晰地同科学探究的成就区分开来。对倾向于信任专家和依赖专业判断的社会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科学家尤其要对公众负责。

xvi

## 第一版序言

我 1967 年元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了三场贝克曼讲座 (Beckman lectures)。这本书的三章内容就是对这三场演讲内容的完善。第一章尝试评价语言学过去对心智研究的贡献，主要基于对语言本质的研究和猜测。第二章着重谈跟心智相关的语言学的当代发展。第三章讨论语言和心智在未来的研究方向，这一章的讨论猜测性很强。简言之，这三章关注的是过去、现在与未来。xvii

对研究语言学史的既定状态而言，即使是尝试评价过去的贡献也必定被认为是非常不确定的。现代语言学存在一种幻觉，不仅认为现代“行为科学”在一些重要方面已由“猜测”转向了“科学”阶段，也认为早期的工作可以安全地交付给古文物学家。幻觉，我相信是最准确的说法。很显然，任何理性的人都会赞成精密分析与谨慎的实验。但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行为科学只是模仿自然科学的表面特征，其科学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限制研究主题或关注特别边缘的问题获得的。如此收缩关注点如果能有真正的学术意义，则是合理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很难证明收缩范围能得到深刻的且有意义的结果。更进一步说，存在一种自然的但又不幸的趋势，即由通过谨慎的实验和严格的语料处